



李镇西  
教育作品  
卷六



# 李镇西

WORKS BY  
LI ZHENXI ON EDUCATION

# 我的语文课堂 上

他的课堂和文字，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这里有他行云流水般的语文课堂——把倾听还给孩子，把阅读还给孩子，把问题还给孩子，把创造性的解答还给孩子，把语文的快乐还给孩子……

李镇西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镇西教育作品  
WORKS BY LI ZHENXI ON EDUCATION

卷 六

李镇西  
我的语文课堂  
上

李镇西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镇西 · 我的语文课堂：全 2 册 / 李镇西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12-4053-8

I . ①李 … II . ①李 … III . ①中学语文课—课堂教学—教学研究  
IV .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8993 号

李镇西教育作品 卷六

**李镇西：我的语文课堂（上）**

---

著 者：李镇西

---

出版人：朱 庆

终 审 人：孙献涛

责任编辑：庄 宁

策 划：孟 幻

封面设计：刘庆海

责任校对：张 独

责任印制：曹 靖

---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50 (咨询)，67078870 (发行)，67078235 (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mailto: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650×970 1/16

字 数：380 千字

印 张：32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4053-8

---

定 价：49.80 元（全 2 册）

## 总序

# 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

李镇西

恍如昨日。

自 1982 年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乐山一中，我带着心有不甘的文学梦步入教育，一转眼整整 30 年。

蓦然回首，那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教育细节在脑海中翻腾，学生、同事、领导、家长、师友……那些与我共同编织教育故事的人和事，如春风拂面，甘之如饴。

## 1. 机遇一直与我有不解之缘

30 年，我与改革开放同行。这让思想冲破牢笼、宽容个性、鼓励创新、追求人的解放的年代，是我人生的大机遇。

30 年，我有幸得到许多人的帮助。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老师，《班主任》杂志首任主编王宝祥先生，湖北名师蒋自立先生，成都玉林中学原校长杨兴政先生，成都石室中学原校长王绍华先生，乌克兰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著名教育家朱永新先生，中央教科所原所长朱小蔓教授，成都武侯区教育局原局长雷福民先生，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先生……

给我帮助的当然不限于以上诸位，他们于我或师恩浩荡，或友情深湛，但都对我关切备至。那种崇尚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悲悯情怀，糅合着宽容、理解、大爱无私的心灵，为我的教育生涯谱写了一曲曲亢鸣之音，他们都是我人生路上一个个不凡的机遇。虽然我都曾在文章里细致地写下他们，但今天再次一一回想，仍然不免泪眼婆娑。把这些具体的微观机遇，放置在改革开放的宏大机遇下认真体味，一种感恩的幸福洋溢心中。

## 2. 机遇之下，我喜欢实干

我总以为，教育是做出来的。所谓的“做”，不只是拿着“旧船票”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要不断创新，不断超越。30年再回首，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教育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对于一直钟情的班主任工作，我一直都在探索。我带的每一个班都有不同的研究主题。未来班、青春期教育班、集体主义教育班、民主管理班、公民教育班……30年过去了，我的班主任历程有着清晰的脚印。

语文课程亦复如是。从语文教学到语文教育，从语文素质教育到语文民主教育，我在浪漫语文——训练语文——生活语文——创造语文——人格语文——民主语文的主题线索下，从未停止过课程探究。我所有教案都没有重复过，哪怕是同一篇课文，我也不会参照以前的教案。我把讲授每一篇课文都当作我的“第一次”。不曾停止的感悟和发现，令我不断处于收获之中。

从教师到学者，从学者到学校管理者，我在乐山一中、成都玉林中学、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市盐道街外语学校、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等多个单位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一直没变，但身份的呈现方式和我的教育角色却不断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标志着我视野的转换、实践的丰富和探索的深化。

## 3. 实干中我崇尚阅读

我注重四类阅读。读教育报刊，以了解同行在思考什么；读人文书籍，以拓展自己的人文视野；读有关中学生的书，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走进学生的心灵；读教育经典，这是直接聆听人类精神永恒的回音。

我特别强调人文阅读对教育的意义。我长期订阅《炎黄春秋》《随笔》

《老照片》等杂志；最近一年，我阅读了《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南渡北归》《聂元梓回忆录》《中苏关系史纲》《瞿秋白传》《民主的细节》《西班牙旅行笔记》《我和八十年代》《一句顶一万句》等人文著作。这些阅读和教育都没有直接联系，但与思想泰斗对话，与人文巨匠为伴，可以让我站在人类的高度看待人生，站在人生的高度看待教育，站在文明和文化的高地审视课堂，让我对教育的理解更深刻、更全面。

我的博士导师朱永新教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教育。”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我在学校倡导阅读，组织读书沙龙，让老师们从阅读中获取教育的养料，在更开阔的背景下理解教育。

#### 4. 我坚持写作，记录教育生命的流淌

写作与实践相随，与阅读同行，与思考为伴。30年前，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总想当作家，但命运让我成了中学教师，于是我便把教育当作诗来写——我的著作《爱心与教育》最初的书名就叫作《心灵写诗》。当我孜孜于当作家时，我找不到写作的灵感；当我放弃作家的梦想而全身心投入教育时，文学的激情却令我思想奔涌。

初读苏霍姆林斯基，我为他三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所感动，那朴素亲切的文字深深地启发我：其实我也可以这样写呀！虽然我没想过要写什么“教育名著”，但用文字记录自己青春的足迹，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我试着写我的教育故事。从此，写作深深嵌入到我的教育生活中来。

写作的过程，就是反思、审视、总结、提炼、升华教育实践的过程。在向同行们作汇报时，我经常说：“对教育的爱大家都是一样的，对教育的执着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仅仅是对这份爱与执着多了一点思考，并用笔将其记录下来罢了。仅此而已。”

#### 5. 思考与写作是孪生姐妹

思考，就是任思想燃烧。凭良知做事，用常识质疑，这是我的常态。教育，是关于精神的事业。带着一颗思考的大脑从事每天平凡的工作，就是教育科研。

思考，有时候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素养，只需要良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同样，质疑一些谬误，也不需要多么坚实的学术功底，只需要常识就可以判断。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我对“任安妮之死”的反思。

任安妮曾是我班上的一名学生，因为迟到，我罚她在教室外面站了一会儿。这事看起来不严重，我的做法也不是特别过分。但后来我才知道她迟到是因为生病，再后来她因白血病去世了。就是这么一个突发事件，唤起了我的良知。我开始反思，如果任安妮没有生病，我就可以让她罚站吗？当然不是，罚不罚站与学生是否生病没有直接关系。我永远不可能向活着的任安妮说声“对不起”了，但我每天还面对着健康成长的一批又一批学生，如何善待他们，尊重他们，这考验着我的教育良知和教育真诚！

我反思的结论是：尊重学生并非教育本身，只是教育的前提，但剥夺了学生的尊严，就剥夺了教育的全部。教育是心灵的艺术，离开了心灵的理解与引导，就失去了教育最根本的意义。

这样的思考，贯穿我 30 年的教育生涯。我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今天，我们的教育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教育油彩越来越厚，口红越来越艳，脂粉气越来越重。培根说：“德行如宝石，朴素最美。”朴素的教育就是真教育。扯下标签，剥除包装，拒绝炒作，告别华丽，愿中国教育回归朴素，愿中国校园恢复宁静。曾几何时，无休无止的“验收”、“迎检”，花样翻新的“特色”、“模式”……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学校不断被折腾，喧哗器叫中，教育没有了。宁静的校园，才有真教育……

## 6. 倔强坚持一个纯真的自我

崇尚率真。儿童的心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长大，但我总不愿丢弃率直和真诚。说真话、做真人，是我永远的追求。

远离城府。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高境界，就是彼此尊重，互相信任。我最痛恨不动声色的算计和彬彬有礼的欺骗。

保持本色。从年轻教师到教育学者，从班主任到校长，我都善良依然，纯正犹存，热情不褪，我希望自己捧出的是一颗纯净的心。

抛弃面具。当今社会，迫于环境或内心驱使，许多人戴着面具生活。但

我更喜欢素面朝天，真诚待人，以心灵赢得心灵。

追求单纯。人生不过几十年，什么都想得到，结果往往什么都得不到。单纯一些，我们会更轻松快乐。单纯地对待教育，会让我们收获单纯的教育快乐。

拒绝成熟。成熟往往是圆滑与世故的代名词，而这恰恰是我深恶痛绝的。我不反感生存的策略，我也会警惕自己不被欺骗，但作为教育者，还是“幼稚”一些好。幼稚即纯真。

忠于心灵。守住内心最朴素的信念，执着追求真理，决不随波逐流，不要跟孩子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有人说：“一个人如果宣扬他自己都不信的一套，那他就做好了做一切坏事的准备。”

执着理想。时间流逝，变化无常，但有些东西绝对不能变，比如少年的理想。我永远铭记 19 岁的王蒙在《青春万岁》中说过的那句话：“忠实于少年时代的友爱、热情与誓言，这是人生最严肃的事情。”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你坚持自我的个性，让你失去了很多；也有人说，你的个性成就了你。我同意后者。简单、直率、敏锐、执着、死心眼儿、我行我素……恰恰让我一直保持着单纯的教育心。平和的心态，赋予我纯粹的教育幸福。我总认为，幸福比优秀更重要。因为优秀与否是别人的评价，而幸福与否是自己的感觉。

## 7. 保持童心，钟情细腻的教育情怀

我今年 54 岁了，可我自认为还保持着 24 岁时第一天参加工作时的兴奋、憧憬、向往……

“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原苏联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以如此细腻的情怀，表达对教育的热爱，体现的正是童心。苏霍姆林斯基说：“对孩子的依恋之情，这是教育修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这就是说，在教育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思想”、“理念”、“模式”等，而是依恋孩子。依恋孩子，需要童心。

我现在当了校长，经常提醒自己要怀着一颗童心和爱心，理解孩子，尊重孩子，为他们提供需要的服务，为他们现在的快乐和将来的幸福付出我们

的情感和智慧。

当我们把理念、模式、规模、国际化等宏大概念作为教育的主旨，而忽略每天在校园里笑眯眯地向你打招呼的孩子时，这样的教育是被异化的。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才是真教育，才有价值。只有你把孩子放在心上，孩子才会把你放在心上。上个月我去马来西亚讲学，一周以后回到学校，碰到一个初三的孩子对我说：“李校长，好久不见您，我好想您！”那一刻我真感动！这是一颗童心对另一颗童心的思念，也是一颗童心因另一颗童心而感动。

机遇、实践、阅读、写作、思考、个性、童心，是我30年从教之路的重要关键词，我以此坚守30年来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与青春同行，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

30年来，在许许多多读者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出版了包括《爱心与教育》《从批判走向建设》《做最好的班主任》《用心灵赢得心灵》《我的教育心》在内的40余部著作。北京朗朗书房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撮其精要，用心汇编成12卷作品结集出版，我对他们心怀敬意。

2013年2月20日

写于成都

## 自序 细思碎想

课堂实录整理完了，但感到还有话要说，因为在整理课堂实录的过程中，不断有想法在脑海里闪动。尽管这些想法都很零碎，不成体系，但我还是把这些细思碎想记了下来，算作本书的序言。

### 一

“用身体写作”——这是前几年人们对所谓“美女作家”的嘲讽，但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也是很恰当的。因为我所有的教育教学著作，都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考，而是对实践的记录。没有这些实践，我就写不出这些书。这难道不是“用身体写作”吗？虽然说起来我还读过博士（惭愧），但比起李海林（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上海洋泾中学校长）他们，我的确不擅长纯理论思维，再加上我本身就是一线教师，因此我打定主意，这一辈子就“用身体写作”——用实践说话，把理论文章让给李海林他们去写，我愿意给他们提供研究的素材。

## 二

“举重若轻，行云流水”是我追求的课堂教学境界。

所谓“举重若轻”，是指教师的内在功底以及对教材的处理艺术。这里的“重”，指的是教师本人的文化储备和课文固有的文化内涵；“轻”则指的是深入浅出的教学。备课时，教师应该尽可能深入地钻研教材，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核，感悟其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但是在课堂上，则要尽可能尊重学生的能力基础和认知水平，将课文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生活打通，让他们轻松地感悟课文内容。任何因脱离学生实际而让学生不知所云的“精彩讲解”、“深刻分析”，都不过是教师“举重若重”的自言自语。

所谓“行云流水”，是指驾驭课堂教学环节、流程、节奏等的艺术。语文课有多种上法，不能定于一尊，但我追求自然、潇洒与“随意”。如果把语文课比作画国画，那么有人喜欢画工笔画——追求课堂的精巧，甚至课前对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精心设计，因而胸有成竹，对这样的老师我充满敬意，但我不愿意画工笔画，而愿意画“大写意”，愿意课堂上有一些“突发情况”——这最能激发我即兴发挥的教学灵感。不把课堂填得太满，留一些空间给学生，留一些空白给自己，让教学的流程随课堂现场的情况而自然推进，教师“教”的思路和学生“学”的思路融为一体，教师和学生不知不觉地走进对方的心灵，同时也走进课文的深处。

## 三

阅读教学的起点在什么地方？应该在学生的心灵。

我以前上课，往往是先抛出一两个自己精心设计的问题——所谓

“牵牛鼻子”，然后组织研讨，在研讨中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这样做的立足点在教师，而非学生。能不能让学生先提问？能不能尊重学生对课文的“第一印象”？能不能从学生的疑问开始我们的教学？

完全可以，因为对一篇课文来说，首先是学生学，而不是教师学。因此，现在我主张，要把“教”（教师）的过程变成“学”（学生）的过程，无论备课还是上课，都应该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设计和操作。

## 四

有的课充满了知识和能力的讲授与训练，便被指责为“语文课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有的课充满了思想和情感的激荡与流淌，便被批评“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或主题班会课”。我们当然可以折中一些或者说“圆滑”一些，把语文课上得既有知识、能力，又有思想、感情。偶尔上一堂这样“全面”的课是可以的，但不太可能（至少我不可能）每堂课都如此。

评价一个老师的课是否“语文”，恐怕不能只凭一堂课就作结论，否则所作结论往往为盲人摸象般的自以为是（我有时正是这样的盲人）。如果所上课文的重点刚好是进行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这样的课无疑是语文课；如果所上的课文是侧重于视野的拓展，思想的启迪，感情的熏陶，这样的课也很“语文”。

因此，我们要着眼于整个三年，给学生一生有用的语文素养——知识、能力、思想、情感、习惯、信念、价值观等，而不是某一堂课的面面俱到。只要是文本出发，从语言出发，无论是训练还是熏陶，都是语文课。管他“工具”不“工具”，或者“人文”不“人文”！

## 五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一个扯不清的话题，属于典型的“公婆”之争。

理论指导实践，我当然同意这个永恒的真理，但我更相信：“理论是苍白的，生活之树常青。”

杜威说过，我们所强调的，总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失的。当人们不重视理论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理论学习；当理论泛滥而且其中不少理论是“伪科学”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呼吁重视实践。当然，这也因人而异。比如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

令我反感的是，一些专家喜欢用理论来吓唬一线老师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要老师们削实践之“足”去适他们的理论之“履”。读这些专家的书时，总是感到自己的语文课根本就不是语文课，总是感到自己有这样的“认识盲点”和那样的“理论误区”，总是感到自己二十多年的语文教学真是在“误人子弟”。总之，越读越自卑，甚至连课都不敢上了。

不过，这是以前。现在我已经不自卑了。我坚信，忠于语文而又面对学生实际的课，就是好课，我凭什么要被你牵着鼻子走？

## 六

阅读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教师、学生、作者三方平等“对话”的过程。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教师意识到师生之间的平等主体关系，这比起过去只盯教师的单一主体观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我认为

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将文本作者纳入阅读过程中的主体行列。当然，作为主体的文本作者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他不是“现场主体”，而是隐蔽的或者说没有出场的主体，他可能与我们身处同一时代，但在不同空间，也可能与我们根本就不在同一时代，因而这个主体在阅读过程中是无法言说的，处于沉默状态。

然而，文本作者之所以是主体，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精神承载者，而且参与了我们的对话与交流，引导、影响、制约着我们的理解。他引导、影响、制约的中介便是其作品。我们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或者我们只能这样理解，而不能那样理解，除了理解者自身的因素外，还取决于作品。

把握这一点特别重要。过去，我们之所以对课文进行随心所欲的错误理解，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忽视了文本背后那另一个主体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有了这个隐蔽主体，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便不可能拥有绝对的自由。

这绝是否认理解者（师、生）的能动性。在解释学发展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读者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两种倾向。前者强调读者的绝对主观性，所谓“作者写了什么并不重要，读者读了什么才是重要的”，这导致了理解的相对主义；后者强调文本的客观性，这导致了理解的绝对主义。我们认为，如果从能动的理解者这个角度看，读者的确是理解的中心；但读者的理解毕竟是对文本的理解，读者的整个理解都是围绕文本进行的。我们强调尊重文本，实质上是强调我们对另一个主体的尊重。

唯有教师、学生、作者三方平等对话，我们的阅读教学才会真正充满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的民主精神。

## 七

对一些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的理解，常常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言之成理，无所谓“标准答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只要方法正确，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作品的意义，并达到阅读者之间的理解的统一。这两种意见显然都是片面的：前者是理解的相对主义，后者是理解的绝对主义。

应该说，任何理解都是相对的，也都是绝对的。理解的相对性是理解的本性，是理解固有的性质。理解的主观性、局限性、不确定性、不完全性、历史性、变动性、开放性等因素，决定了特定时空的理解者的理解只能是相对的。同时，理解的绝对性也是理解的本性，是理解固有的性质。理解的客观性、非局限性、确定性、完全性、永恒性、固定性、封闭性等因素，又决定了特定时空的理解者的理解具有绝对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理解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我们认为，理解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相对之中有绝对，确定性之中有不确定性，差异之中有同一性。因为“理解”本身就意味着对象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理解”就是把握文本的本意。当然，对某一个具体的理解者来说，其“正确理解”只是“相对正确”，只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瓢水，但由无数理解者理解到的“相对正确”却构成了所有理解者对文本理解的“绝对正确”。当然，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理解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正常的。不同理解之间符合文本意义的重叠，便是绝对正确的理解，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不相同的树叶一样，理解没有完全一样的，也没有完全不一样的。

再以“一千个读者心目中的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例：每一个读者理解到的“哈姆雷特”都是原作的部分意义与读者“前理解”相结合

的产物，属于相对理解；但一千个“哈姆雷特”中读者把握到的原作意义（即对原作理解一致的部分）的总和，便是绝对理解。

只要理解，就总会有误解；只要理解，就总能理解到一点什么（总能这样或那样地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在相对的理解中有绝对理解的成分。

## 八

什么是“语文民主教育？简言之，语文民主教育就是充满民主精神的语文教育，就是尊重学生各种精神权利的语文教育，就是给学生以心灵自由的语文教育，就是师生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语文教育。

从根本上说，语文民主教育与语文素质教育是相通的。但是，要在教学中真正提高学生的素质，就必须站在民主教育的高度走进学生的心灵，面对每一个富有个性的学生。因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陶行知语）。缺少对学生的民主态度，具体说，就是离开了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和对其潜能的信任，离开了教育过程中精神与精神的交融、心灵与心灵的呼应，任何教育都不是陶行知所说的“真教育”，而只能是“伪教育”。

对语文教育而言，“民主”并不仅仅是教育手段，也是教育内容，更是教育目的——自主、探究、合作式的学习方式和课堂氛围必然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健康发展乃至创造力的激活，而语文教育本身（包括教材）所蕴涵的丰富民主养料将有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铸造；但从长远来看，民主教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赋予语文教育的面向未来的使命——通过民主的语文教育，培养学生的平等、自由、宽容等民主素养，使学生成为个性鲜明并具有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的现代公民。

## 九

我一直反对“借班上课”。

从1985年第一次上公开课开始，我上过的公开课恐怕有几百场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外地“借班上课”。应该说，绝大多数时候，我“借班上课”赢得了喝彩，但也有那么几次比较平淡，或者说不太成功，比如2002年11月在江苏如东，比如2003年10月在浙江杭州，比如2004年5月在浙江永嘉……我不愿意把责任推给学生，仿用一句流行语——这都是“借班上课”惹的祸！

成功教学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如果是在本班上课，一般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是“借班上课”，至少我是很难在课堂上与素不相识的学生“水乳交融”。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我借班上课，得到的评价都还不错，但我很清楚，不管我在课堂上多么“机智”，最后都是想方设法把学生置于自己的思想框架之内；不管学生在课堂上多么热闹，显得多么有“主体性”，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约地都成了我表演的道具。

但这也不能怪我。试想：连“知己知彼”（在教学上就是师生互相了解）这个起码的要求都达不到——我们从参加教育工作第一次备课起就被告知必须“备”学生（这个学生可不是抽象的整体，而是具体的个体）——教师怎么能上课？但这课又必须上，那当然就只有由教师制定一个比较完美而又巧妙（即看不出痕迹）的教学框架，包括设计一系列“问题”，等等。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得不提前做好“预制板”，于是，教师完全掌握了学生思维的主动权，“以不变应万变”，当然“游刃有余”。

我丝毫不怀疑有的教师能够借班上出真实的好课——这样的课，我也是经常上的，但我完全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地成功——在事前一点不了解学生阅读基础的情况下进行一堂真正有效的课堂阅读教学，对